



# 第一章

## 北京大会之后：不平等世界里的不平衡进展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北京召开十年之后，全世界许多妇女组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取得了多少进展？对于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理应提出的重要问题，但绝非容易回答的问题。

评价性别平等进展的任务向人们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标准的收入和福利指标为研究提供了某些指导数据，但是要想做出恰当、有据的评估，光靠这些数据是远远不够的。不仅需要开发某种适当的分析方法，而且还应该认识到，衡量标准本身或许就很值得推敲。怎样才算是进步，往往是个颇有争议的领域，对于什么是“好社会”以及妇女在这种社会中的地位，有着各式各样争长论短的看法。“进步”概念本身就历经多次修订和重新定性，而且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复杂进程并非因循统一标准路径，结局往往难以保证。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未必能拓展人类的自由，“发展”的理念也并不总是、或仅仅与某种现代性版本相关联。

尽管提出上述告诫，但毫无疑问的是，自1975年首次举行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来，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确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不乏积极的变化。全球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女生入学率迅速增长，从而大幅度缩小、填补、甚至在某些

情况下扭转了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下降，不但降低了产妇死亡的风险，并且减轻了不可避免地落在妇女和女孩肩上的无偿照料家庭的压力。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不论政治活动、工作场所还是跨国移民流——的人数也增加了。

妇女生活中的这些变化是与伴随经济发展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但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因国家体制改革和社会运动而得到刺激和加速。就此而言，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爆发了一系列政治变革，其中包括世界许多地区专制制度的转型，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涌现出了支持某些妇女纲领的执政势力。这种大环境有助于推动国际政策纲领走向更加注重民主和人权的发展进程。

无论是国内还是跨国的妇女运动都在利用政治环境的变化，在国家立法和政策改革机制内外开展工作，增进妇女权益；而且妇女运动本身也促进了政治环境的重新塑造。借助机会的窗口，妇女运动得以同包括民众运动、政党和政府在内的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结成有效的联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取得的最显著成就，也许就是将性和生

育健康及权利、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以及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问题，摆到了关于人权及人类发展的全球和全国辩论的核心位置。正如表 1.1 所示，跨国妇女动员对于制订全球规则产生了明显影响。正如某些长期社会变革问题观察家指出，

联合国公约体系、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其他国际和区域法律文书已经剥夺了男性统治的合法性，而另一方面，女性教育、晚婚和劳动力市场开放等综合社会效应正在消蚀父权社会的残余支柱。<sup>1</sup>

表 1.1 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国际和区域法律文书（1990 至 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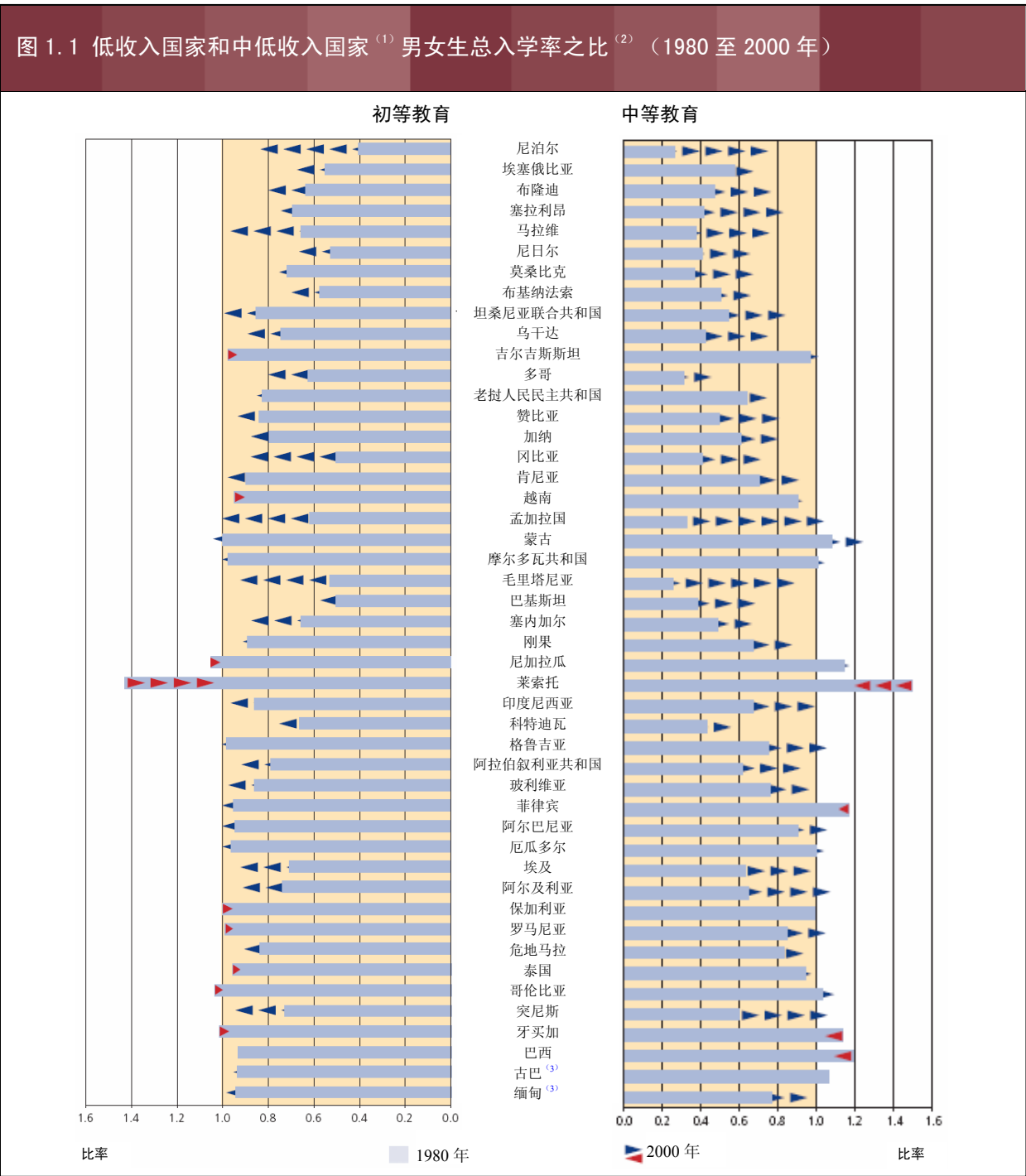
承诺领域	《儿童权利公约》  通过—1989 年 生效—1990 年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通过—1990 年 生效—2003 年	《美洲防止、惩罚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  通过—1994 年 生效—1995 年
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	第 2 条：“缔约国应尊重本公约所载列的权利，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儿童均享受此种权利，不因……（包括性别在内的理由）而有任何差别。”		第 6.a 条：“妇女有权不受一切形式的歧视。”
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第 19.1 条：“缔约国应（……）保护儿童不致受到包括（……）性侵犯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  《议定书》第 1 条： <sup>(1)</sup> “缔约国应根据本议定书的规定，禁止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	第 10 条：“不得使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受到酷刑或残忍的、非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第 1 条：“（……）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系指不论在公共场所还是在私人住所发生的，以性别为由造成妇女死亡或受到身心及性伤害或痛苦的任何行为或举动。”  第 3 条：“每个妇女都有在公共和家庭环境不受任何暴力侵害的权利。”
经济和社会权利		移徙工人（含移徙女工）应在工作条件（第 25 条和第 54 条）、社会保障（第 27 条）、接受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的机会（第 43 条），以及在法庭面前的地位（第 18 条）等方面享有与国民平等的待遇。	第 5 条：“每个妇女都有权自由而充分行使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可依靠各种区域及国际人权文书所体现的对这些权利的充分保护。”
公民和政治权利		第 26.1a 条：“缔约各国承认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为了维护其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利益而参加（……）工会及任何其他协会的会议。”	第 4.j 条：妇女“有权享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本国的公共服务，并参与包括决策在内的执行公务”。

资料来源：《联合国条约集》，2001；国际劳工组织，2002a；美洲国家组织，2000。

表 1.1 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国际和区域法律文书（1990 至 2004 年）（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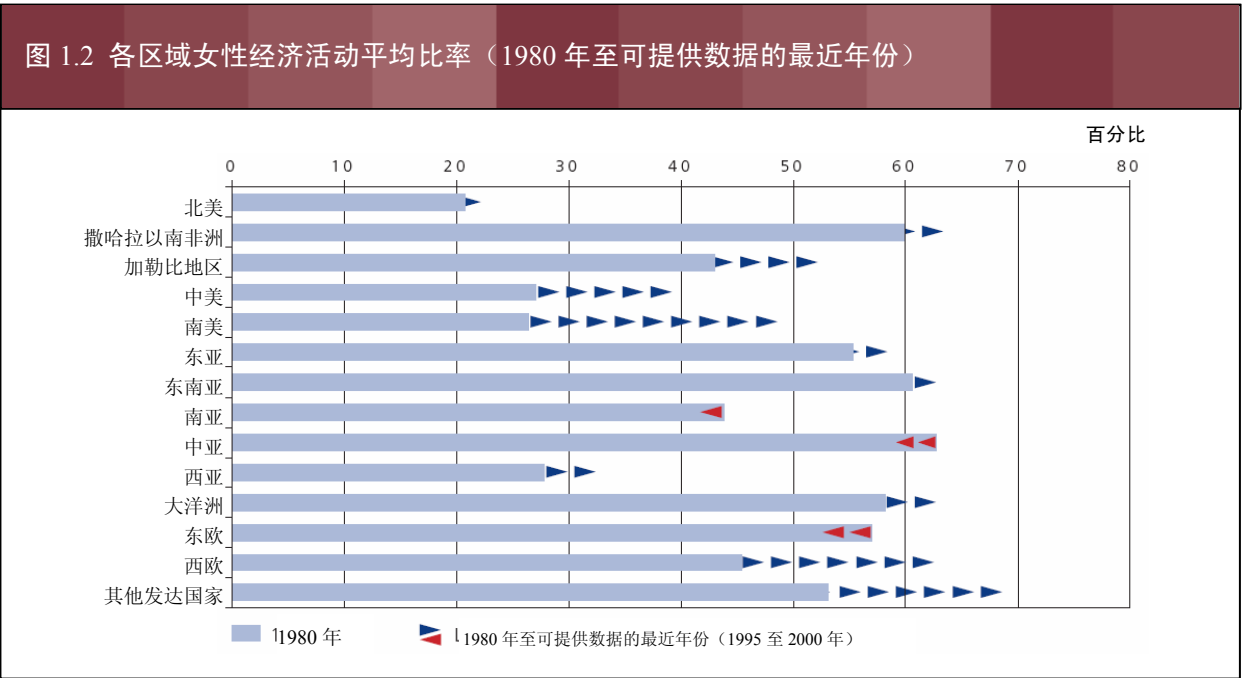
《家庭工作公约》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	承诺领域
通过—1996 年 生效—2000 年	通过—1998 年 生效—2002 年	通过—2000 年 生效—2003 年	
第 4.1 条：“有关家庭工作的国家政策应促进（……）家庭佣工与其他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待遇。”			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
	第 7 条和第 8 条规定，强奸、性奴隶、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任何其他形式性暴力的严重性，不亚于反人道罪和战争罪。	议定书第 2.a 条： <sup>(2)</sup> “本议定书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打击贩运人口，特别关注妇女和儿童。”  议定书第 2 条： <sup>(3)</sup> “本议定书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打击偷运移民，（……）同时保护被偷运移民（包括妇女在内）的权利。”	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第 4 条旨在促进如下诸方面的平等待遇，即：保护家庭佣工，使其不致在就业和从业方面；在职业安全 and 健康方面；在培训机会方面；以及在录用或雇用的最低工资方面受到歧视。			经济和社会权利
第 4 (2a) 条：“应在家庭佣工成立或加入其自己选择的组织和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权利方面（……）促进平等待遇。”			公民和政治权利

注：（1）《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00 年通过）；（2）《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2000 年通过）；（3）《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2000 年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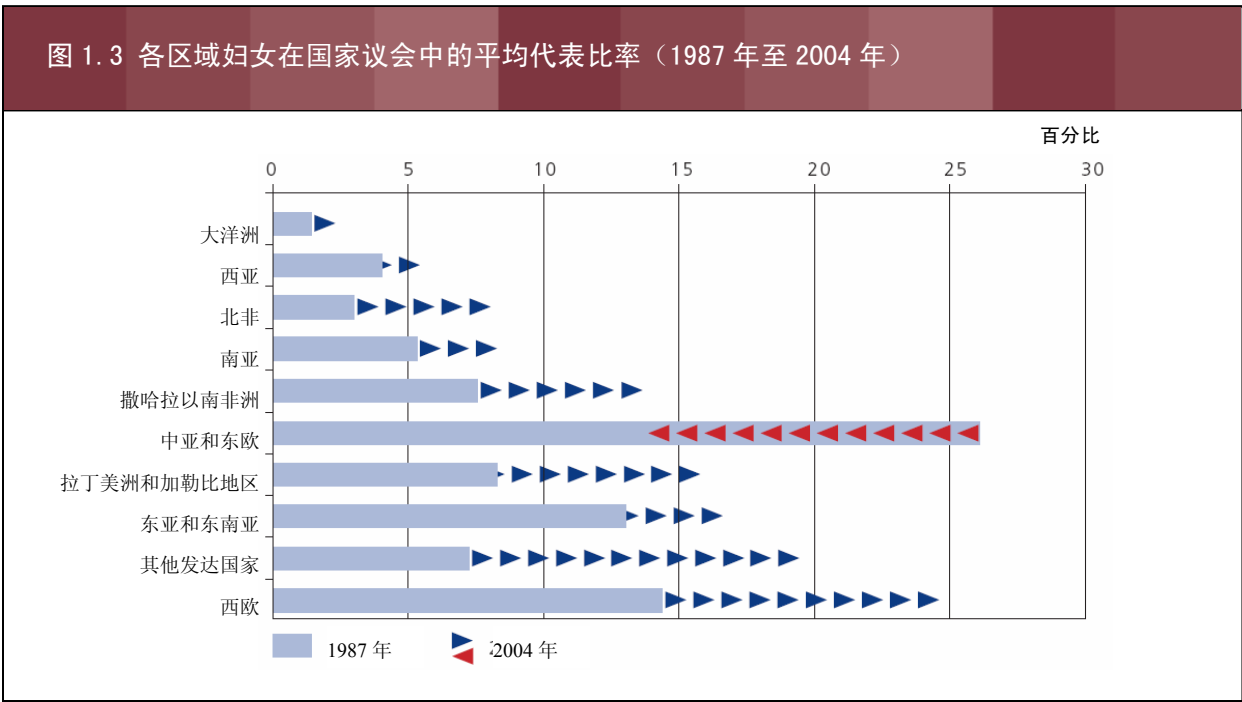


注： (1) 只包括能提供 1980 年和 2000 年中等教育数据的国家，根据各国 2000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图表法，单位：美元），按递增顺序排列。(2) 若比值为 1，表明男女入学率均等；若比值低于 1，则表明女生入学率低于男生入学率。(3) 没有提供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 2004b 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2003 年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议会联盟 2004 年数据计算；联合国统计司，2004；联合国，2003。

## 性别不平等继续存在

如果说妇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实现了她们的某些历史性诉求，如果说性别平等在教育、就业和政治代表权方面有所进展，必须从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不利的经济环境出发，对于这些积极成果加以衡量。以教育为例，虽然许多国家在性别平等、特别是初等教育的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进展速度要比预期的慢得多。在较高的教育层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均衡仍在很大程度上偏向男孩，尽管情况已有所改变（见图 1.1）。<sup>2</sup>

参加工作和参与政治的妇女人数是增加了（见图 1.2 和图 1.3），但这种日趋缩小的性别差距却掩盖了薪酬和地位上明显存在的性别不对称。妇女依然集中在报酬低且没有权力的工作层次，在收入、地位和权力方面受到重重阻碍。

在许多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家庭差距都在拉大，<sup>3</sup>这也意味着妇女当中的不平等现象有增无减。虽然世界银行声称，在 1990 至 1999 年间，全球贫困率从 32% 下降到 25%，贫困人口从 13 亿减少到 11 亿，但关于世界银行的贫困计量方法却存在着重大争议。尤其是由于将中国的特殊情况也计算在内而造成计量失真，因为中国的发展情况抵消了其他很多地区持续贫困或贫困加剧的趋势。<sup>4</sup>鉴于收入情况大多是在住户一级计量的（其中忽略了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情况），所以很难估算贫困发生率的性别差异，但是考虑到妇女的可用资本和土地有限，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较低，以及妇女在无偿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过重等诸多因素，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妇女在全球贫困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然而，这样讲并非否认如下事实：有些妇女位居精英之列，对于绝大多数人口极为

不利的政策却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正在改善育龄妇女的生活机遇；但在有些国家，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同时，人为制造的男女人口比例（性别比）过高的情况也愈演愈烈。<sup>5</sup>在“重男轻女”倾向和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这两种现象并存的社会里，由于女婴遭到虐待、忽视和遗弃，加之新技术的出现对于“要男孩不要女孩”的性别偏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性别比失衡问题日趋深重。表 1.2 列出了部分国家由于男女待遇不平等所造成的“缺失女性”比率的最新估计数，<sup>6</sup>这些国家的女性比例偏低问题比较严重。图 1.4 展示了中国和印度的幼儿性别比率，这两个国家占了全球“缺失女性”的 80%。近十几年来，印度和中国创造了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而这一点恰恰证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保证增进性别平等。

在更为普遍的层面上，劳动力的“女性化”或许能够最突出地说明妇女成就的矛盾性。过去二十年来，大多数国家的妇女从事有偿劳动的机会增多了，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工作的条件 and 环境却变差了。伴随正规部门就业的非正规化和临时化，世界各地的非正式工作比重增加，雇主们可以借此降低劳务成本。然而对于普通男女来说，其结果则是工作越来越不稳定，生计越来越没有保障。国际劳工组织最新估算数据表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北非地区除外），非正式就业日益成为女性的主要就业渠道，而对于男子则并非如此。<sup>7</sup>

对上述这些结果，无法做出单一的解释。性别不平等深深扎根于所有社会，并通过包括政策干预在内的各种习俗和制度而得以复制。本报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推进性别平等的有利

表 1.2 “缺失女性”百分比估计数

国家和地区	年度	女性 实际人数	实际 性别比	出生预期 性别比	预期 性别比	预期 女性人数	缺失 女性人数	缺失女性 百分比 <sup>(1)</sup>
中国	2000	612.3	1.067	1.050	1.001	653.2	40.9	6.7
中国台湾省	1999	10.8	1.049	1.052	1.002	11.3	0.5	4.7
大韩民国	1995	22.2	1.008	1.047	1.000	22.4	0.2	0.7
印度	2001	495.7	1.072	1.039	0.993	534.8	39.1	7.9
巴基斯坦	1998	62.7	1.081	1.042	1.003	67.6	4.9	7.8
孟加拉国	2001	63.4	1.038	1.040	0.996	66.1	2.7	4.2
尼泊尔	2001	11.6	0.997	1.037	0.992	11.7	0.1	0.5
斯里兰卡	1991	8.6	1.005	1.052	1.006	8.6	0.0	0.0
西亚	2000	92.0	1.043	1.042	1.002	95.8	3.8	4.2
阿富汗	2000	11.1	1.054	1.024	0.964	12.1	1.0	9.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96	29.5	1.033	1.039	0.996	30.6	1.1	3.7
埃及	1996	29.0	1.048	1.044	1.003	30.3	1.3	4.5
阿尔及利亚	1998	14.5	1.018	1.043	1.005	14.7	0.2	1.2
突尼斯	1994	4.3	1.021	1.043	1.000	4.4	0.1	2.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00	30.7	0.987	1.017	0.970	312.5	5.5	1.8
全世界		1 774.8					101.3	5.7

注：(1) 缺失百分比以“缺失女性”人数除以实际女性人数得出。

资料来源：Klasen 和 Wink,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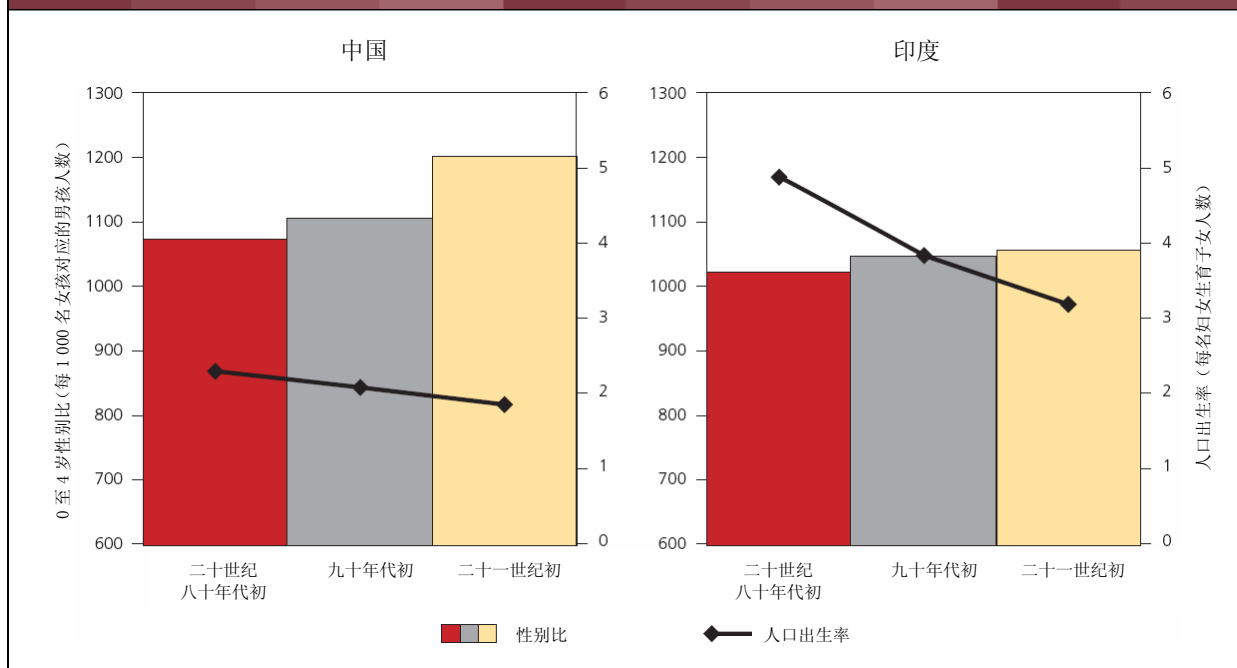
条件和不利条件而言，发展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盛行不衰、以均衡预算和自由市场为主导的政策模式，对于促进社会平等、尤其是纠正男女不平等来说，是更容易了，还是更困难了？

## 不良的政策环境

如果当前的辩论议题是上述政策模式在减少贫困和促进增长方面的作用，那么大多数分析家

都会一致认为，这种政策模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与不平等的逐步加深联系在一起的。<sup>8</sup> 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结构调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工作，生活急剧贫困，从而引发了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普遍不信任感。加深不平等现象和造成社会危机的各种政策有其具体的性别影响，将结构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妇女，把妇女视为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家庭的“减震器”和最终陪护者。<sup>9</sup>

图 1.4 中国和印度的幼儿性别比和人口出生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二十一世纪初）



注：中国的性别比和人口出生率均为 1982 年、1990 年和 2000 年的数据；印度的性别比为 1981 年、1991 年和 2001 年的数据，人口出生率为 1980 年、1990 年和 2000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人口出生率数据出自世界银行 2004b；性别比系根据联合国 200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以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1（二十一世纪初）数据计算得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亦称《华盛顿共识》）以强化私有财产权和受利润驱动的市场为中心，要求“减少国家干预”。为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重点是稳定价格和敦促政府限制公共支出。与此同时，以国家为中心的策略和政策受到广泛怀疑，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策略和政策助长了庇护制度、贪污腐败和集权主义，并且缺乏国家对公民负责的问责制。由于早期的政策已经基本丧失了吸引力，尚未就改革政策纲领进行充分辩论，于是，新自由主义理念很快风靡于世，批评意见只能靠边站。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丢失的十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市场原

教旨主义的严重局限性、风险和人力成本。

在尚未建成适当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推行各项调整政策，使得城乡低收入家庭的生计受到沉重打击。日常生活缺乏保障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特征，就连保护机制最严密的公共部门职员也不能幸免，比如教师、护士和公务员等。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被迫经常涉足非正规经济领域，以贴补其日渐萎缩的收入。<sup>10</sup> 在“抢钱”的竞争中，<sup>11</sup> 迫于捉襟见肘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妇女成为农业临时工，或在人满为患的城市非正规经济领域打工；有不少妇女加入了从农村到城市、乃至跨越国境的移民流。

与此同时，福利服务在悄无声息中变得商业化，使得较贫困家庭不得不进行调整：照料家庭的重任更多地压到了妇女和女孩肩上。由于医疗保健费用飙升，妇女及其子女越来越看不起病了。市场并不是像设想的那样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叱咤风云，而是通过现实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具体化”<sup>12</sup>或实际运行。<sup>13</sup>市场是不平等、社会排斥和歧视妇女的强劲驱动器；妇女照料家庭的无偿劳动对社会结构起到凝聚作用，但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与回报。

## 2000 年的评估发人深省

就在研究人员记录宏观经济政策的社会成本的同时，人们在描述全球发展态势时开始采用更为清醒、务实的态度，特别是在 1997 年俄罗斯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此次危机突出暴露了建立无序金融流通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的脆弱性。到 2000 年开始着手评估 1995 年北京会议五周年的工作成果时，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能否改善人民生活，已经不再那么有把握了。

虽然通货膨胀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控制，但是价格的稳定是以牺牲增长和减少就业机会为代价的。新的市场准则甚至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增长率实在令人失望（参见第一编）。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愈益频繁，其经济和社会后果可想而知。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差距普遍拉大。各国政府在筹集财政资金用以资助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以及为弥补严酷的市场排挤与失败而采取的其他再分配措施方面遭遇严重困难，致使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很多地区受到社会危机的持续打击，这种情况或许最突出地表现为国内骚乱和政局动荡，经济贫困和社会疾苦等诱因往往引发连绵不断的内

战。在这些缺乏安全保障、充斥暴力的地区，很少有人能够幸免于战祸，不论其是否作为战斗人员积极参与其中。女权活动家让世人看到，在战争和武装冲突时期，尤其在波黑战争和卢旺达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妇女最容易受到伤害。这两起事件向全世界暴露了性暴力犯罪及有系统地利用这些犯罪作为战争武器的罪恶行径。<sup>14</sup>然而，由于妇女作为家庭照料者和供给者的社会性别角色，她们注定要受到战争和暴力的深刻影响。

即便在武装冲突已经平息的地区，犯罪率往往急剧攀升，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和性暴力事件更是层出不穷。除了武装冲突的伤害及其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破坏性影响之外，法律和秩序、警务和司法体系、保健和教育体系也都土崩瓦解，社会和道德准则日益削弱。<sup>15</sup>即便在“正常”时期，犯罪和暴力也是有增无减。城市居民纷纷雇佣私人保安服务，市区里修建高墙壁垒和隔离区，人们对警察和司法系统普遍丧失了信心。<sup>16</sup>

##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报告

撰写本报告的出发点是基于如下认识：在近期各种相关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的大漩涡中，在竞相吸引注意的诸多国际政策辩论议题当中，对性别问题的洞察力有所减弱。有关自由化和施政改革的方案得到了必要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辩论，但是没有从性别平等的观点出发进行系统评估。根据联合国大会 2000 年 6 月提出的要求，联合国系统内外关注世界妇女进步问题的组织和研究人员正在筹备定于 2005 年完成的北京会议十周年评估工作。这个时候由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应该说恰逢其时。

本报告力图在当前调整发展方向的工作中重

新确立性别平等的核心地位，以便应对同发展进程休戚相关的某些重要挑战，比如：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平等和社会保障；以及民主化。这些目标与 50 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所阐明的宗旨交相辉映，并通过后来由无数国家签署和批准的多部重要国际公约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这些目标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历次会议的重心所在。

近几年来，联合国系统内外各组织发表的几份重要政策报告都以不同的方式，从各种各样的观点出发，强调了性别问题在发展进程中的突出地位。<sup>17</sup> 本报告为此次辩论提供了新的观点和独特的分析。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不打算面面俱到地评述《北京行动纲要》确定的有关妇女问题的所有领域，而决定集中探讨特定范围内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属于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上对于实现妇女权利和谋求性别平等至关重要的政策领域和体制改革领域。为反映出北京会议后续议程在近期内所取得的成就，并探索之所以出现模棱两可的结果的原因，本报告直接或间接论述了《北京行动纲要》所阐述的 12 个关键领域中的 8 个关键领域：妇女和贫困；妇女和保健；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妇女和武装冲突；妇女和经济；妇女参与执政和决策；有利于妇女进步的体制结构；以及妇女人权。为便于开展分析，本报告选取了以下四个关键主题领域，并在其中对上述议题进行了讨论。

## 宏观经济、福利和性别平等

以性别观点分析宏观经济政策，首先从审视当前主流经济政策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所引发的诸多争论领域入手。主流分析家倾向于

把宏观经济政策视为一个不受性别影响或性别中立的领域，忽视政策遴选所造成的性别影响；然而这些政策在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平等、贫困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无一不对性别平等或缓解性别不平等产生了影响。以下三章（第二、第三和第四章）分析了非正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现增长和社会平等方面是否强于新自由主义模式；若果真如此，这些非正统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更加有效地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

## 妇女、工作和社会政策

接下来的第二编（第五章至第八章）探讨与经济自由化有关的政策改革如何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改造职业领域和民众享有社会保障的机会，特别是这些政策改革给低收入妇女带来了哪些影响。在过去十年里，妇女在多个经济部门作为优势劳动力崭露头角，产生了潜在的积极影响。可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妇女谋求有偿劳动是否出于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与此同时，妇女在料理家务和照顾家庭方面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关键问题是：近年来通过政策改革向妇女开放的一些机会是否足以抵偿同样的政策纲领给社会，特别是给妇女施加的负担与风险。虽然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和政府机构发起了无计其数的革新倡议，力图解决非正式女工所面临的生活无保障问题，但是在社会保障（比如养老金）和社会服务（比如医疗保健部门）方面的标准改革则往往拉大了性别差距。性别分析很少能为社会政策提供资料，往往沦为“沉默的词语”，在政策辩论中受到排挤，只能靠边站。

## 妇女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

关于妇女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第三编（第

九章至第十二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这些方面，妇女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这一编首先具体阐述了近十年来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妇女在正规政治机构和民选议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不过，在以极大的热忱争取增加代表机构中的女性表决权的同时，也需要冷静地认识到，根深蒂固的男性偏见和社会等级观念依然存在，在大部分政治环境实现平等的目标还遥不可及。第三编的另一个重点是公民社会的女权活动，尤其是考虑到围绕宗教信仰、种族身份或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对女权主义和妇女问题做出各自反应的政治运动。女性在这方面的知名度有着模棱两可的特征。在体制方面，仔细审议了当前在争取“善政”以及相关的体制改革纲领、尤其是决策权力下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配额制和“保留席位”等策略是否让妇女得到了切实的收益，还是口惠而实不至？

## 性别问题、武装冲突和谋求和平

冷战结束以来，内战的扩散、从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武装冲突、以及同当代“反恐战争”有关的大规模军事入侵，都对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看到，强奸成了常用的战争武器，性侵害是动乱和武装暴力泛滥成灾的环境特征之一。但是现代战争对于妇女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所造成的影响，尚未引起类似的关注。在制订和平方案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妇女推动和平倡议以及解决冲突的作用。这应和了女性本质温婉贤淑、能够平息风浪的理念。但是有关冲突后政府机构的正式谈判却没有让妇女参与其中，致使她们丧失了参与和平重建的机会。有两章（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分别考察了战争期间、谋求和平期间以及冲突后环境中带有性别色彩的战场。和平对于妇女利益的

有限保障，是性别考虑往往极易被忽略的又一实例。

## 将性别问题重新纳入政策纲领

本报告提出的分析方法认为，各种社会、社会关系、经济体和权力结构都带有明显的性别分界线，正如阶级、民族和种族分界线一样鲜明触目。基于性别的不平等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是社会权力关系、准则和惯例的产物。

妇女问题研究揭示了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资源、权利和权力分配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痼疾，从而打破了无私奉献与人人平等的家庭神话，颠覆了家永远是“无情世界中的有情港湾”的幻想。<sup>18</sup> 记录家庭生活的黑暗面，并不等于充分解决并纠正了私人领域中侵犯少女和妇女权利的不公正行为，无论是严重的资源剥夺，还是人身或性虐待。事实上，家庭内部是最棘手、最有争议的政策环境之一。即便是在已经通过进步法律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地方，由于高高在上、有时甚至是腐败的司法和警务系统的执法工作软弱无力，致使那些需要得到法律保护以免遭家庭暴力和虐待的人往往依旧面临伤害和危险。不过，近十年来在有关性别问题的政策辩论中，家庭和住户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些令人关注的政策转变中可以看出家庭内部问题的研究成果：针对穷困家庭的各种扶贫方案，无论是以小额信贷形式还是以现金转拨形式，都越来越多地以妇女为扶助对象，因为妇女会以有利于增进家庭和子女福利的方式运用手中的资源。

现在，世界银行等机构也开始关注某些制度领域——尤其是家庭内部——以及传统和习俗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法律领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但这些机构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是有选择

性的，而且是不均衡的。<sup>19</sup> 在这种情况下，对性别问题的沉默与漠视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市场和宏观经济（贸易、资本等）流量没有进行同样的性别分析，显然是认为这些流量基本上全都是有益无害的，是性别中立的。然而本报告发现，这既不符合经济现实，也不符合家庭实际；国家、社区、政党或“进步”的社会运动也未必会遵循性别中立的道路。实际上，现实情况恰好相反。本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性别不平等是现代社会里一个顽固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特征，尽管这种不平等的某些表现形式近年来已经有所改变。

## 性别问题和男性

本报告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在私人和公共生活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各类制度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性别关系，但重点主要集中在妇女方面（按阶级、种族、族群和社会等级划分），并在分析中充分认识到妇女置身其中的复杂的社会-性别关系网络。鉴于近年来主管发展问题的官方机构和某些学术研究在思想（和语言）上出现了转变，有时在不经意间淡化了妇女从属地位的重要意义，所以，坚持关注妇女问题十分重要。<sup>20</sup>

妇女问题研究人员提请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妇女转移到妇女和男子，而后又重新回到了男子方面。加勒比地区的女权活动家描述了这种变化如何导致“男子处境危险”的论调。加勒比地区的妇女在教育 and 保健等多项指标上都超过了男子，但妇女失业率则比男子高出一倍，再加之女性户主的比例颇高（在很多加勒比国家，女户主占 35% 以上），妇女在就业中遭到排斥的现象削弱了认为“妇女的经济状况优于男子”的论断。<sup>21</sup> 此外，尽管对男子学历较低的关注是正当的，但社会对于妇女和男子的期望

显然不同。男子的学业成绩不佳，并没有阻碍他们获取财富和政治利益。而妇女必须获得更高的学历，才能与男子竞争工作和决策职务，才有机会获得与男子同等的生产资源。<sup>22</sup>

然而，如果性别等级制度不瓦解，如果妇女的从属地位依旧是重大社会问题，这未必意味着男子占据优越。男权主义文化可能对男子起反作用，甚至是破坏作用，这就再次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男子也会因其性别特征而面临风险。成年男子的死亡率过高就是一个明证。经济压力打破了“男子养家”的准则，而在许多文化中，男子的这一角色与其自身认同感密切相关。例如，2001 年印度安得拉邦的男性棉农因负债累累而创下非常高的自杀率。<sup>23</sup> 另一个实例是 1989 年以后，由于与精神压力有关的健康风险以及失业和劳动力市场波动所导致的酗酒问题，中东欧成年男子死亡率居高不下。<sup>24</sup> 男子固然是家庭暴力和社会暴力的主要施暴者，但同时也是家庭环境以外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强调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不意味着性别关系是一成不变的；承认性别等级制度的不断变化是十分重要的。当前的社会变革进程及其与政策的相互作用表明，虽然某些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取消了，妇女得以享有新的机会和自由，但是出现了其他形式的从属关系和新的制约因素。妇女获得教育，从事有偿劳动，赢得投票权，竞选政治职位，并且对其性行为和生育功能有了一定的控制能力，但与此同时，妇女也不得不参与细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遭受工作场所的歧视，面临更多的个人不安全因素和日益商业化的性行为。同样，关于青年文化的人类研究表明，人们在破除旧模式的同时也在不断重新塑造性别角色，并复制其中的某些传统属性，比如男子的侵犯性。

## 现行政策纲领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 重新发现“社会”

近年来，政治和政策环境为争取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日益膨胀的普遍不满情绪，以及来自内部及外部主要经济学家的批评意见，国际金融机构现已表示愿意对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给予更多关注。诸如“参与”、“社会资本”和“善政”等象征性概念标题引出了对这些政策关注领域的重新发现。这种转向在世界银行 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该报告将“社会风险管理”确定最具持续性的扶贫基础。<sup>25</sup> “善政”纲领显然力图提高发展过程的参与性及其针对妇女等边缘化群体的需要做出反应的能力。

然而，虽然上述转变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国际金融机构与其批评者之间达成相互谅解，并使得《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但是其中的许多核心政策原则依然故我。占主导地位的一揽子政策，即所谓《后华盛顿共识》，保留了正统经济学的核心要素，即：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在“善政”纲领中加入民主、参与、权力下放和社区所有权。与其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一种新模式，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新“契机”更为确切。<sup>26</sup>

由此可见，在现行的政策纲领中既有重要的连贯性，又有一些创新内容；应该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近年来对社会难题做出的某些政策反应，比如世界银行的《减贫战略文件》。在利用“贫困”和“社会保障”等通行词汇达成表面共识的背后，对社会政策的各种不同理解仍在继续争夺

公众的注意力。这些相互抵触的政策理解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优先考虑事项、以及对国家责任和个人及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承担义务的不同理解。在社会风险管理体系中，国家只负责提供应对风险的社会安全网，并在私营部门失利的情况下提供风险管理手段。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早期最低限度安全网政策的延续，并凌驾于性别平等政策纲领之上。

关于社会政策的另一种观点以集权再分配、平等和普及社会供给为前提。这不只是一种抽象的主张，而是以欧洲各国建设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为依据的。近年来的调整和改革或许淡化了这些原则，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这些原则。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力争实现社会包容和普及社会供给的目标，这些国家围绕社会责任问题开展了相当热烈的公众辩论，人们在思想中依然保留着对于社会平等的承诺。巴西、南非和智利等国尽管存在着惊人的不平等现象，但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将社会保障机制扩展到农村地区和非正规就业领域。

### “善政”改革和民主缺憾

注重“善政”是《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组成部分。但是在那些依靠善政动员捐助者和推行政府决策的国家，对施政纲领的接受程度和记录情况都比较复杂。要求国家有正式的民主法规并保护公民及政治权利，这几乎是所有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与政府进行关键性合作的前提条件。妇女运动也不例外。对于许多争取民主的运动来说，动员妇女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禁止政治活动家利用常规舆论渠道（政党、工会等）开展活动的情况下。然而，动员妇女反对专制法则，并不能保证妇女在完成转型后的正规政治体制中享有代表权，特别在急剧转型

或者作为某些排他集团或精英集团之间谈判结果而转型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现在，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机构，正式成为民主国家，但是民主政治的巩固程度及其机构形式不尽相同。即便在举行选举之后，政党依然实行精英统治，制度化建设很薄弱；民众参与机制没有深入社会，法律和秩序的实施很少能够成功地保护公民、尤其是社会边缘化群体依法享有的公民权利。人们越来越担心半专制国家、“柔性独裁”和“男性民主”将卷土重来。<sup>27</sup>即便以宪法条文和重要政策声明的形式对妇女权利做出了高调政治承诺，但还远远不能保证将这些条文转化为实际的官方政策、转型支出、以及行政和服务机构的有效程序。

政治承诺与有效的政策实施之间的关联决定了“施政”的结果。妇女在促进性别平等立法和确保将性别平等转变为法律并贯彻执行方面所遇到的重重困难，说明妇女渴望加强国家能力和问责制。因此，多家多边及双边捐助机构都将施政改革置于工作议程的优先位置，从而为纠正与性别有关的能力建设和问责制方面的失误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具体做法包括：扭转公共开支管理系统的性别偏见，提高公共机构（比如文职和司法机构）人事配置中的性别平等程度，促进法治改革等，以保障妇女享有资产的权利，确保对虐待妇女和对妇女施暴行为提起公诉。

### 形成对照且有争议的各种解释

对“善政”纲领的广义理解包括政治自由化、公民参政和人权，将社会不平等问题作为对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承诺加以解决。这样的纲领涵盖了数十年来各种社会运动和妇女运动一直面对的国家合法性、执政能力和问责制等各类问题。有

鉴于此，旨在增强国家能力并使之对公民更加负责的施政改革，在世界各地受到普遍欢迎。不过也有批评者指出，虽然施政改革能够、而且应该解决政府合法性和被排斥群体公开参政等问题，但实际上这些改革往往被某种非常狭隘的偏见所左右。这种偏见集中表现在：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对于经济实施“良性”管理，为支持经济活动而扩大私有产权。假如以此作为衡量“善政”的主要参数，性别平等问题往往就被排除在改革者及其改革方案的关注对象之外了。

有些改革的确可能给妇女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对投资环境和农民生计至关重要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改革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少地区，拥有和使用土地依据的是多种法律制度。可是，过分关注地契的市场优势和个人所有权，就会危及社会所认可的妇女对土地的权利要求，肯尼亚等国的历史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sup>28</sup>

### 权力下放所体现的进步与退步

善政改革也鼓励将政治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机构、市政当局和村委会。强调政府“贴近民众”同许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地方民主政治”倡议相互呼应。有些国家通过实行配额制增加了妇女在地方政府中的代表权，让大量妇女有了初次执政经验：印度的村委会为妇女设定了30%的配额，就是这方面最著名的实例。

可是，一旦妇女代表担任了政务，她们争取性别平等的意愿和能力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给予她们的支持。在一些极不平等的社会，总是存在着这样的风险：精英们（通常为男性）会“攫取”替代机构或新生机构

的权力，从而减少妇女参政对于规划和支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的可能性。此外，如果权力下放还包括向部落长老或宗教会议等“传统”权威授权，实施传统和习俗就会严重损害妇女的利益。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地方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民主原则和民主做法；而地方政府本身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巩固民主政治或非民主政治。

由此可见，近期捐助方对于“善政”问题的关注虽然值得欢迎，但是主要得看如何解释善政。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是否将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参政视为改革目标的组成部分并将其纳入制度改革；是否把减少社会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作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的核心指导原则。

### 身份政治的复苏

“身份政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具有特定影响力的现象。“身份政治”系指围绕民族、种族和宗教身份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并往往与主流制度和长期实行边缘化和歧视的历史形成对峙之势。为应对此类权利主张，许多国家颁行了宪法和法律条文，以适应民族、种族和其他方面的多样性。

虽然在某些基于身份的权利主张与性别平等观念（后者基于基督教的普救论原则）之间存在矛盾，但这种关系未必是不可调和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sup>29</sup> 例如，赋予土著民族及其文化以各项权利的国际法（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规定，只要习惯法不与普遍人权原则发生抵触，即应予以尊重。这项规定已被许多国家纳入宪法，尤其在拉丁美洲国家，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普遍做法。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积极参与这些运动的妇女往往发现，很难让政府倾听

要求性别平等的呼声；积极投身民族主义运动的妇女亦有同感。<sup>30</sup>

对人权和妇女权利纲领的猛烈攻击也源自宗教身份的复苏，其中包括维护本质上侵犯妇女权利的“传统”性别角色和权力体系。塔利班政权对阿富汗妇女的压迫就是最极端的实例，某些时事评论员甚至斥之为“性别清洗”。此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在伊朗，1979 年夺取政权的伊斯兰运动就将其对于君主制和美国的不满情绪及其政治体系（即“教法统治”，又称“法基赫的监护”），建立在对伊斯兰教义的极端宗法解释的基础上。接下来的一系列社会和性别关系调整导致了国家和家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侵犯妇女权利而不受惩罚，由此对性别关系和社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sup>31</sup> 不过，鉴于伊朗妇女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群体，都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现已通过国会内外女权倡导者的努力，对有关妇女权益的教条主义立场和早期的多项伊斯兰化措施进行了重新协商和改革。

对于本国和外国势力的恶劣行径感到羞愤和无奈的民众，为以上这些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一些发展政策及其给人们带来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种种后果，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混乱。为更深入分析这些运动，需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现代性”，对于促成其思想倾向的西方消费主义和自由意志理论造成的种种冲击，进行深入剖析。从性别观点来看，还需要探究这些运动对于妇女的吸引力：无论作为运动的成员还是领导者，妇女的影响力都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她们没有进入正规权力机构。<sup>32</sup> 妇女公开活跃在一些运动当中，并扮演着颠覆传统性别准则的角色。例如，2002 年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参与煽动屠杀穆斯林的印度民族主义激进妇

女就是一例。妇女不仅大张旗鼓地公开参与上述各种运动，并且支持旨在限制妇女权利并以宗教和传统的名义让妇女从属于男子的改革方案。

其中的一些运动所推行的“传统”和宗教学说也许既非传统亦非正宗，而是最近才杜撰出来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因此，某些女权倡导者开始提供支持性别平均做法的替代性宗教读本。这是穆斯林世界中女权激进主义的主要动向之一，在某些情况下，依据伊斯兰教法检讨妇女权利属于可以允许的讨论范围之内。可是，假如宗教当局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发言人，平等、民主和对人权的保护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得不到丝毫保障，基本上也就没有争论和对话的空间了。<sup>33</sup>

正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的信仰也关系到一系列国家形态和法律解释。现代伊斯兰运动并非全都反对妇女权利，较为温和的土耳其正义和发展党就是如此。2002年11月，该党执掌政权，人们曾普遍担心这将导致国家倒退到保守的宗教政治。然而，新政府接纳了世俗民主政治，而拒绝了该党的某些支持者所实行的正统伊斯兰教义解释。土耳其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指示全国各地的伊玛目（精神领袖）在人权和妇女权利领域提供精神指引，这一举措得到国内多名女权倡导者的欢迎。该国各地的信众被告知，所谓“荣誉杀人”（即男子杀死被怀疑玷污家庭名誉的女性亲属）是一种触犯法律的犯罪行为。<sup>34</sup> 由伊玛目传达这些信息，其“宣传面之广往往是人权倡导者所无法企及的，土耳其全国有1 500万男子每周五参加礼拜仪式”。<sup>35</sup>

## 在经济政策和性别平等之间 建立联系

保障民生和创建有利的经济环境，是实现性

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何谓“有利的经济环境”？妇女能否在获得资源、发挥影响以及享受福利方面争取到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本人及其家庭和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方式所最终依赖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从本报告以下几章所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以贸易、金融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导向的政策，对妇女及其伴侣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主导政策模式趋向加深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并加速边缘化的世界，一个不容许再分配的世界，一个政府牺牲公民的利益以迎合全球势力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保障性别平等的世界。

有鉴于此，女权活动家愈来愈多地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大范围的全球力量结构方面，重点关注与宏观经济趋势有关的普遍不公正问题的发展情况，比如，不加节制的跨国资本流通、偿还债务、贸易自由化、不平等的贸易模式以及用于满足福利需求的公共资源开支的萎缩等因素，对处于劣势和遭到歧视的社会群体造成的种种影响。其中一个实例，就是力图对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影响，这需要世界各国的女权支持者团结并组织起来，与各国国内的妇女集体行动相互呼应。<sup>36</sup>

上述这些全球经济公正与妇女权利之间的联系，对于争取妇女享有性和生育健康及权利的全球运动十分重要。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给社会造成的强烈影响的持续关注，由于反对世贸组织以及在八国峰会和国际金融机构会议期间举行的大规模跨国联合示威活动的兴起，以及南半球妇女团体的领导作用等因素，都对跨国行动起到促进作用；这些组织在性和生育健康及权利方面的工作始终与强有力的经济公正纲领联系在一起（见方框 1.1）。<sup>37</sup>

### 方框 1.1 性和生育健康属于人权

权利与需求是不可分离的。生育健康和性健康以及人类的其他基本需要——教育、公共卫生、清洁水源、营养等——同样重要，且相互依存，同属于人权范畴。尤其是对妇女来说，良好的产前及产科护理、安全避孕以及其他健康问题，无一不与可靠的交通运输、公共卫生条件和清洁水源等基本福利设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假如妇女得不到便捷、平价的生育健康和性健康综合服务，无权自行决定生育子女和性行为，她们也就无法享有自由、人身安全和个人发展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都以人类的基本需求为依据，共同构成一张完善的网络。如果要按优先次序排列这些权利，就否定了妇女生活的基本现实，对贫困妇女来说尤为如此。

资料来源：摘自 1999 年 3 月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五周年联大特别会议”期间由世界各地 80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妇女联盟散发的传单，转自 Petchesky, 2003:15。

然而，创建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组成的政治联盟，帮助决策者认识到全球经济公正与性别公正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切实实现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政策变化，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试图影响制订全球规则的过程中，女权活动家不仅要支持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重新规划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且要赢得那些并不经常留意性别平等问题的主流行动者的支持。<sup>38</sup>

此外，近年来开展经济公正和性别公正磋商的全球政治环境也不是很有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梵蒂冈和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代表一致反对通过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行动纲领》，并在此后的历次会议上坚持反对有关性别平等的各种建议。保守的宗教团体最强烈地反对堕胎和同性恋，但这些立场只不过是表象，他们在骨子里反对的是性别平等本身。在开罗会议和北京会议五周年成果的审议过程中，这种矛盾表现得十分显著。<sup>39</sup> 尽管在妇女权利问题上存在上述矛盾，但由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于国家政权的控制毕竟有限，所以九十年代还是得以在性和生育健康

及权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开罗会议五周年和北京会议五周年的审议工作已经圆满结束，这两次会议的成果完好无损，并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 面对复杂的现实

可是，这些积极成果来之不易。众多妇女组织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气候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举行的历次联合国会议、首脑会议和特别会议所取得的许多成果看来是相当脆弱的。当前，由于恐怖主义、穷兵黩武、伊拉克战争以及对单边主义的仇视，造成全球政治危机，使得九十年代赖以取得成果的人权和妇女纲领以及整个多边体系受到削弱。人权纲领备受打压，不仅在民主制度依然薄弱的国家是如此，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核心地带也是如此。无论在北美还是欧洲，少数民族和移民、特别是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权利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更加深了人们对穆斯林群体的怀疑态度，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错误地给所有穆斯林都贴上了仇视西方和民主价值观的标签，在性别问题

上更是如此。

可是，在妇女权利和性别问题上，不存在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与宗教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文明的碰撞”。<sup>40</sup> 近几年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全球谈判中往往联合、有时甚至替代梵蒂冈，在性和生育健康及权利的问题上成为反对妇女纲领的主要战略谋划者。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 2000 至 2004 年间政府对于节育的预算支持，提倡禁欲和加强父母对青少年的管教，以遏制性自由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

面对围绕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十周年和北京会议十周年举行的各种区域和分区域讨论所产生的压力，各国政府通常不会让步。但是在抗拒这些压力的国家之间出现了裂痕和矛盾。南半球各国政府试图组成一个强大的集团，以便在贸易谈判中同北半球相互抗衡，这给实现全球经济公正带来了希望；但新联盟内部在性和生育健康及权利问题上还缺乏共识，而且意见分歧严重。妇女组织认识到，只有坚持不懈地施加压力，并且积极参与正在就全球经济公正展开辩论且基本上属于性别盲区的领域，才有机会将经济公正问题与性别公正问题联系起来。

## 妇女运动：举步维艰的变革之路

若不想让性别公正问题再一次从工作日程中隐去，妇女运动就需要同政府机构和社会运动结成新的联盟。与政府合作，意味着在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所有决策领域扩大妇女利益的代表范围。性别问题分析揭示了经济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妇女运动也可以要求改变不利于妇女的政策，但围绕这些政策问题展开辩论的场所却很少能够充分代表妇女的利益。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论坛

上，性别观点很难获得承认；不过，为性别问题争取预算的游说活动现已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与新老社会运动结成联盟至关重要，但还需要细致协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颇有发展前景的新动向，就是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女工有了新的组织形式，同时某些资格较老的工会组织也更加关注非正式女工的需求。可是，在争取全球经济公正的运动中，并不是所有组织都对其工作中的性别问题保持敏感和关注，并热心投入。<sup>41</sup> 在这些组织看来，尚未触及较广泛社会或经济公正问题的妇女运动在成效上有其局限性。性别平等的进展不平衡，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争取性别平等的各种力量的本质和策略，此外还由于性别不平等得以不断复制的机制和惯例。大家公开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妇女组织如何同时做到以下两点：消除妇女的从属地位和资源享有权不平等现象，挑战不断加深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不平等的更为广泛的程序和政策。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希望，通过阐明与性别和经济公正有关的某些程序——经济程序、政治程序和社会程序，本报告能够就上述问题提供某些答案，从而有助于各方就如何最有效地推动性别平等展开辩论。近几十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原先公认的“平等”和“再分配”等价值观现在已经统统靠边站了。许多观察家认为，目前盛行的各项政策——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基于市场的福利享有权——是实现包括北京大会在内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次全球会议既定目标的主要障碍。本报告接下来的各章将用性别这面透镜来深入剖析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各种要素，并研究这些改革要素对于平等和公正所产生的影响。

## 注释

- 1 Therborn, 2004。
- 2 UNESCO, 2003; Jha and Subrahmanian, 2004。
- 3 Milanovic, 2003; Cornia et al, 2004。
- 4 中国的情况引发了争议，因为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和贫困率下降是通过非正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的（例如，中国维持了不可兑现的货币和国家对银行体系的控制），并非是执行国际金融机构标准指令的结果。因此，如果使用因中国的扶贫成就而产生偏差的全球证据来为正统宏观经济政策纲领辩护，那是成问题的。
- 5 在生物学的角度上，女性更加强健，因此人口的女性应该多于男性。可是在某些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社会里，女孩受到忽视，这种人为干预形式有利于男性的存活（Klasen and Wink, 2003; Das Gupta and Bhat, 1998; Jackson and Rao, 2004）。
- 6 Sen, 1989, 1990。
- 7 ILO, 2002b。
- 8 Milanovic, 2003; Wade, 2001; Cornia et al, 2004。
- 9 Elson, 2002。
- 10 Bangura, 1994。
- 11 Bryceson, 1999b。
- 12 Polanyi, 1957。
- 13 Hewitt de Alcántara, 1993。
- 14 UN Secretary-General, 2002。
- 15 UN Secretary-General, 2002; Rehn and Sirleaf, 2002;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2003。
- 16 Caldeira, 2000。
- 17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1985年、1989年、1994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联合国大会要求该报告每五年更新一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集中阐述性别问题。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于2000年和2002年分别发表了《世界妇女的进步》（第一卷和第二卷）。世界银行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的政策研究报告。
- 18 Whitehead, 1981; Folbre, 1986; Dwyer and Bruce, 1988; Sen, 1990; Agarwal, 1990; Kabeer, 1994; Hart, 1995。
- 19 World Bank, 2001a。
- 20 Baden and Goetz, 1998; Razavi and Miller, 1995。
- 21 Seguino, 2003b。
- 22 Bailey, 2003。
- 23 Patnaik, 2003。
- 24 Cornia, 1996。
- 25 World Bank, 2001c; Holzmann and Jorgensen, 2000。
- 26 Molyneux, 2002。
- 27 O'Donnell, 1993, 1998; Eisenstein, 1993。
- 28 Whitehead and Tsikata, 2003。
- 29 Phillips, 2002; Molyneux and Razavi, 2002b。
- 30 Hernandez Castillo, 2002。
- 31 Paidar, 2002。
- 32 Basu, 2004。
- 33 Molyneux and Razavi, 2002b。
- 34 WLUM, 2004。
- 35 Ertürk, 2004, quoted in Collins, 2004。
- 36 Mohanty, 2003。
- 37 Petchesky, 2003。
- 38 Liebowitz, 2004。
- 39 Sen and Correa, 1999。
- 40 Sen, 2004。
- 41 Sen, 2004; Liebowitz, 2004。